
“机会平等”鸿沟与共同体的瓦解

——评帕特南《我们的孩子》

魏南枝*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美国立国的根本信念，这种平等并非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之下，人人皆可通过自我奋斗而获得成功，追求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这是美国梦的灵魂；也是时至今日，处于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撕裂和文化对立等多重矛盾之中的美国人仍持有的普遍共识。然而，当机会平等的现实土壤日益流失，上述信念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美国成其为美国的共识作用？

继《手拉手：西方七国峰会》《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减》《使民主转起来》等著作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新著《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他和他的团队通过调研美国各地 107 位年轻人及其家庭的故事，从具体的案例和严谨的数据入手，从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和邻里社区等方面展现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揭示了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益扩大的机会平等鸿沟。

他的研究不仅从收入、财富和社会资本等维度打破了美国“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幻象，揭示了“我们的孩子”正处于“生而不平等”之中的客观事实，证明美国人对“机会平等”的信仰正在逐渐失去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个人主义盛行破坏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群关系，深陷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之中的美国社会共同体正在趋于瓦解，随着“我们的孩子”因日益森严的阶级隔离裂变为一家一户的子女，日益赢者通吃和两极分化的美国社会正在“走向两个美国”。

*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博士，研究专长为比较政治学和美国社会问题。

本书中文版《我们的孩子》由田雷和宋昕翻译，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如帕特南所言，在美国文化中，“社会阶级”向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模糊语词。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和政治叙述中的核心矛盾是种族矛盾，这有利于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的矛盾转嫁到种族层面，避免采用阶级视角来解释美国各类矛盾。但是，本书旨在带领读者从阶级角度来审视为何作者“记忆中的故土已然消逝”这一命题，提供了对“美国梦的危机”的实证解读与独到见解。

由于作者选取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不平等性作为研究对象，并且主要着墨于分析无处不在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阶级固化与阶级隔离现象，美国机会平等是否当然是美国人的共识并且具有普遍性权利的性质、当前美国社会不平等性加剧背后的政治与经济根源等问题，所以他所提出的一些解决路径在现有美国政治格局下难以实现，似有隔靴搔痒之嫌。

《我们的孩子》所揭示的机会不平等与美国孩子的“两极化”未来，与近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囤积美国梦》(*Dream Hoarders*)所揭露的美国中上阶层的各种“囤积机遇”现象有相得益彰之感，从不同侧面呼吁：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或许不可避免，但是，无限度的机会不平等必然减弱美国经济社会的竞争性及发展活力，降低美国民主政体的正当性，也极有可能从“赢者通吃”格局滑向分裂加剧之后的“多输”格局。

一 机会平等：权利还是特权？

“在美国，每个人都应当有获得成功的平等机会”，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的原则。尽管帕特南认为自美利坚民族诞生那一刻起，美国人始终关注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问题，但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和今天所有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各种族的人们都当然享有机会平等。

美利坚这块土地自殖民地时期就充满了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不宽容和歧视。虽然目前欧洲裔白人仍占美国总人口的半数，但美国的人口结构正在经历“从几乎是白色婴儿潮文化到全球化多民族国家的转型”。即使欧洲裔白人内部也存在英裔、德裔、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等的区分，其中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东欧)犹太人等都曾经遭遇多种形式的歧视与排斥；更何况还有亚裔、非洲裔、

拉美裔等有色人种所受到的各种制度性歧视，例如美国立国之初宪法的“五分之三”条款、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法典”、19世纪末颁布的《排华法案》等。

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及其为争取平等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多元化并非美国人一开始就抱有的理想，而是互不相容所造成的惨重牺牲迫使彼此相安共处。因此，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由复杂种族和个人所组成的集合体，使其成为多样性和整体性的混合，也使得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成为美国文化所涵盖的各种亚文化群体之间持续冲撞、协商与妥协的结果。^①

这种多元化与多样性体现在文化层面，如科林·伍达德在其《美国民族：北美十一个竞争区域文化的历史》(*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Eleven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所分析的，美国的文化构成可以分为从政治到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和竞争性的11个区域：就历史渊源而言，东北地区的“扬基国”(Yankeedom)的移民主要为18世纪前后从英国迁来的清教徒，以构建一个“纯净的基督教乐土”为由大量屠杀印第安人；而同期东部马里兰、弗吉尼亚地区的“沿海区”(Tidewater)的移民主要是英国流亡贵族，南部地区的“南方腹地”(Deep South)的移民主要是为扩大土地和生产而从西印度群岛迁来的英国奴隶主，因此这两个地区发展以非洲奴隶为支柱的种植业。美国建国之前就存在的内部区域文化差异，既是后来南北战争爆发和今天美国政治版图“红美国”和“蓝美国”对决的重要原因，也充分说明：一方面，机会平等信条最初并不为所有早期欧洲裔殖民者所认同；另一方面，追求机会平等是欧洲裔白人的特权，当时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并没有信奉机会平等的资格。

那么，如何将交汇在此的各种文化进行融合，以形成对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认同，使其具有整体性？帕特南认为源于“扬基精神”的机会平等信念发挥了这种作用，无论是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美国大众民主的兴起、美国数次宗教大觉醒运动，还是美国独有的自然与地理优势，例如广袤的边疆地带、丰富的自然资源、北美大陆两侧漫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等，都

^① Klaus Rieser, Michael Fuchs & Michael Phillips (eds.), *Configuring America: Iconic Figures, Visuality, and the American Identity*, Bristol, GB: Intellect, 2013, p. 5.

给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实现创业梦想的现实可能性，也使得美国的立国信念或者认同政治具有深刻而多元的社会基础。

然而，帕特南的判断并没有考虑到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一书中的观点。曼认为谋杀性种族清洗往往是现代民族民主国家（nationalist democratic state）的政治民主化潮流的结果，例如托马斯·杰斐逊（被视为启蒙理性的化身）和西奥多·罗斯福两位美国总统都认为对印第安人的根除是有益或正当的。现代性核心的冲突创生了民主化的阴暗面，而这种冲突在美国建国早期历史上体现为，一方面在理想层面要求不同种族对以机会平等为代表的美国立国信念具有统一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将“人民主权”或“公民资格”仅限于在种族上具有相对同质性的欧洲裔白人男性，而对异质种族的人则采用种族清洗或各种排斥性制度安排。所以，在强制推动对机会平等信条等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同时，也在撕裂着原住民、非洲奴隶和异质性种族移民所具有的旧群体和固有文化特质。

曼的分析破除了美国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神话，今天美国相对自由、宽容和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成为新的政治正确，都是以美国民主的这段阴暗历史为前提。并且，这段历史并未真正成为历史，虽然种族清洗早已消失、奴隶制已经废除、制度性的种族隔离不再继续，但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对“美国人民”的同质性与多元化两种诉求的矛盾等始终存在，也使得上述“机会平等”信条这层面纱无力掩盖上述各种矛盾。

这段历史和各种矛盾所积累的重大历史积怨，就会成为各种冲突加剧的“火山口”，也是帕特南所焦虑的“我们的孩子”正在面临壁垒越来越森严的阶级隔离的深刻历史性原因所在：欧洲裔白人，特别是英裔白人，在美国是一个特权阶级，他们通过使用种族清洗、奴隶制、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等工具来对由其他种族所构成的非特权阶级行使其特权；后来逐渐演化为美国白人相对于有色人种所具有的特权等。表面上看来是种族问题，实质上是以种族为区隔标签的阶级问题，只不过，到了帕特南所分析的 21 世纪的美国，这种区隔标签从以种族为主变为了以收入、财富和社会资本等衡量的社会阶级为主，同一阶级内的种族差距在缩小，而同一种族内的阶级差距却在扩大。

那么，为什么帕特南会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平等的市镇？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发生于期间的经济大萧条将镀金时代所形

成的经济金字塔夷为平地，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大发战争财并迅速走向全面经济复苏，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等使得 1945—1975 年的美国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平等。如帕特南所说，克林顿港位于传统工业区俄亥俄州，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克林顿港经济繁荣，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当时美国的实体经济提供了丰富稳定的长期劳动合同的就业机会，并且工会组织有力，涌现了大量过上中产生活的工人阶级。在那个时代，制造业是美国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根基，20 世纪 60 年代制造业吸纳了 28% 的美国工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国工人阶级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其富裕程度最高、经济安全感最强，因此社区共同体发展良好，不同种族的青少年大都得以享有宽广和深厚的社区支持。

这一建立在相对社会平等性之上的经济繁荣周期，不仅给白人工人阶级，也给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例如帕特南的两个黑人同学，杰西和谢丽尔，尽管深受种族主义的困扰，仍然相对轻松地取得了人生的成功。此外，民权运动等从制度上提升了以黑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的政治地位，使得以联邦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色人种开始跻身社会高层，改变了美国建国以来以种族为区隔标签的历史。而帕特南和他的同学们就是在这个社会平等周期中度过童年和青壮年，成长于当时绝对与相对社会流动性都取得超凡表现的乐土——20 世纪 50 年代的克林顿港。但是好景不长，这一社会平等周期结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区隔标签变化所产生的各种效应随着贫富悬殊扩大而日益凸显。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区隔标签的变化？因为在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遭遇各种排斥或歧视的人们使用美国的立国信念，即机会平等信条来进行公民权抗争；并且，这种追求平等公民身份的社会运动与美国的政党政治结合在一起，就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力量。^① 也因为美国的经济客观上需要移民的进入，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排斥性或歧视性的制度，不利于有色人种和部分欧洲白人移民（主要指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迅速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和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之中。从镀金时代、进步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随着

^① Emmanuelle Avril & Johann N. Neem,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and Contestation: Civil Society, Governance 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67–92.

覆盖各种族的公民普选权的实现，随着持续近 60 年的平等化趋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逆转，这个区隔标签自然而然发生了变化。

然而，这种改变不意味着种族区隔的结束。民权运动至今，虽然相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美国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如帕特南所发现的，孩子们的阶级出身（class origins）所产生的机会不平等已经超越种族和性别因素。20 世纪末以来因社会阶级区隔所形成的阶级隔离，正在冲击美国的机会平等信条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经济贫困、家庭破碎、邻里淡漠以及社会组织涣散等，有力地决定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延续，帕特南悲观地认为“美国梦已经破碎”。

综上所述，美国人“应当享有机会平等”理想背后，长期存在着谁可以享有机会平等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机会平等存在于哪些历史阶段的现实鸿沟。回顾二百多年来的美国史，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机会平等往往不是普遍权利，而是一种被赋予了“成功源自个人努力”幻象的特权；也决定了相对较好的社会流动性往往不是常态，而是基于特定历史时期以及美国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等个别情况。

二 共同体的瓦解：阶级、种族与“两个美国”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体，20 世纪中后叶的美国无疑具有诸多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要素，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进而改善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平等性。“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让帕特南这代美国人，尽管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女性的被边缘化，但不同阶层、种族和性别的美国人大都有机会向上流动并走向成功。这既使“美国梦”对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又使美国得以占据道义高点并将美国梦和自由市场等作为“普世价值”向外推广。

但是，这种社会平等周期下的美国梦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的金融扩张和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而出现转折，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支配地位、资本全球性流动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高竞争性改造、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瓦解和收入分配严重向资本倾斜等。

帕特南笔下的乐土——克林顿港位于美国著名的“铁锈地带”——昔日的美

国工业心脏，如今已陷入衰落。制造业的衰落导致工人阶级崩溃，与此同时，涌入了一批以律师、商人等为代表的新上层阶级将卡托巴湖滨地区建成富人区。于是，克林顿港以贫富为标准被划分为两个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家庭和社区纽带逐渐瓦解了，社区共同体的社会规范也日复一日地受到侵蚀。种族区隔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阶级区隔则成为更重要的歧视来源。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所享受的物质条件大都逊于今天，但是他们那代人享受到宽广、深厚和跨社会阶级的社区支持，这种社会资本是富有的。较之于20世纪50年代，今天的美国上层阶级孩子享受着更多特权，而穷孩子身处当年无法想象的焦虑、孤独和失去希望的恶劣境地。“我们的孩子”这一社会理念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富人（有产阶级）的孩子”与“穷人（无产阶级）的孩子”之间的泾渭分明。

帕特南的研究发现，这样的阶级区隔不局限于“铁锈地带”的克林顿港，从俄勒冈州的本德镇到亚特兰大，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到费城……成为今天美国社会的常态。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变化逐渐“拉平”各种族中下层民众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与财富状况。^①当然，各族裔中下层劳动者被经济全球化力量“平等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中下层就逐渐被美国就业市场所排斥，到21世纪白人工人阶级才面临这种困境。“富—穷”阶级区隔替代“白人—有色人种”种族区隔成为最重要的区隔标签，意味着美国的部分白人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因为种族因素而享有特权。白人工人阶级大都恪守盎格鲁—新教文化传统，相信自由市场能够维护辛勤工作良好公民的利益，但是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还面临来自黑人、新移民、难民等的“插队”，这无疑冲击着他们长久以来对机会平等原则的信仰。^②

因此，如帕特南所言，种族、阶级和性别会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人生机遇，这三种要素之间的权力途径已经发生了重构。财富迅速向少部分人积聚，超级富豪与整个美国社会之间的收入鸿沟等，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家庭数量分析，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比重从1971年的61%萎缩为2015年的略低于50%，

^① Bernadette D. Proctor, Jessica L. Semega & Melissa A. Kollar, *Income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Census Bureau of United States, Sept. 2016.

^②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New York: New Press, 2016, pp. 131–141.

同期其收入占比更是从 62% 降至 43%，已经不再占据社会经济结构的主体，美国社会有从橄榄型经济结构向沙漏型经济结构发展的趋势。^①

这种趋势之下的美国社会的阶级区隔变得日益凸显，个人主义盛行之下的新的“两阶家庭结构”模式的产生、单亲家庭等杂乱多变家庭模式的泛滥、社区互助衰减等，导致个人越来越彼此疏离和原子化。随着美国人逐渐放弃了养育下一代的集体责任，无论贫富各地社区的社会关系网都在急剧衰败，越来越依赖个人关系网即父母的社会资本，导致贫穷的孩子因为缺乏家庭和社区的保护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难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此外，对于“我们的孩子”而言，美国的教育不再是促进社会平等的重要场所，而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中介因素，从孩子们的受教育水平、朋友网络和其他社会资本等方面扩大阶级差异，对美国整体的阶级隔离恶化发挥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如果说之前造成种族隔离的是法律，现在就是金钱。黑人与拉美裔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原本就远低于美国社会平均水平，虽然少量有色人种通过奋斗实现了向上流动，但大量黑人和拉美裔依然被经济鸿沟和监禁率的种族不平等阻隔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即使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欧洲裔白人的亚裔，其种族内部的贫富差距远大于欧洲裔白人，也说明亚裔内部的阶级和收入差异比后者严重。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最新报告，在美国劳工薪资 30 多年来停滞不变的同时，非裔和欧洲裔白人劳工的薪资自 1979 年以来差距最大。黑人社区本身出现基于经济撕裂而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以贫穷黑人社区为代表的有色人种穷人区与白人区本种族的富人和中产阶级从居住到教育等都形成越来越森严的阶层隔离是不争的事实，阶层隔离与种族隔离并存的格局，破坏了“我们的孩子”曾经可以依靠的种族基础。例如帕特南认为曾经的“黑人麦加”——亚特兰大市已经日渐分裂为三个城市：一个属于富裕的白人，一个属于富裕的黑人，还有一个属于贫穷的黑人。

21 世纪的美国，对某个种族的歧视属于绝对的政治不正确，但对穷人的歧视算不上政治不正确，政治不正确的种族歧视掩盖了社会分化的贫富差别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得阶级隔离往往被种族隔离的外衣所掩盖。这种阶层隔离和阶

^① Rakesh Kochhar, Richard Fry & Molly Rohal,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5/12/2015-12-09_middle-class_FINAL-report.pdf.

层歧视与美国批判“贫穷文化”传统是一致的，因为美国梦赋予“机会平等”以绝对的道德至上性与政治正确性，强调“勤奋劳动”对形成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反过来，美国梦对于穷人的定性是：你贫穷，是因为你没有辛勤工作，所以对自己的不幸应当自行承担 responsibility，并以此证明精英地位的正当性。通过强调机会平等，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努力淡化阶级意识，而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一书突出了阶级意识。

对于贫穷的有色人种而言，贫穷和种族歧视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形成一个难破解的恶性循环；对于贫穷的白人而言，他们因自视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愤怒，也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寻求“变革”。这些恶性循环和愤怒情绪导致曾经的社会粘合剂——机会平等的根基在流失，社会流动看起来注定要陷入停顿，社会断裂正在持续恶化，美国的身份认同进一步陷入分裂之中。

身份认同分裂要么以盎格鲁—新教文化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冲突为代表，以某种“文化内战”的形式体现出来；要么以白人至上主义与“黑命贵”冲突为代表，以种族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二者都在发挥类似的作用，即掩盖事实上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之下的阶级矛盾。帕特南分析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家庭、社区和学校等都不过是中介变量，根源在于经济困境——既是美国贫穷有色人种群体和社会其他阶层对立加剧的缘由，也是美国遭遇社会排斥的白人工人阶级越来越不满于“精英—草根”对立的原因。

表面的文化或种族冲突，已经不能掩盖美国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固化。个人主义和资本与生俱来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效应等，使得以儿童贫困率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仅威胁着美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美国政治不平等性和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性，这必然破坏美国民主和政治稳定。民主体系本身是一个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如果对立严重，立法、行政效率都会大幅下降，这恰恰是美国的现状。如哈维所说，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垮台意味着民族国家向金融资本交权，金融实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了。^①

缩小阶级鸿沟，将“两个美国”再度建成“一个美国”，是克服当前各种美国病的必由之路。但是，美国现有的制度和价值体系已经难以有效弥合美国社会

^①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 145, 168.

的分裂，也难以解决“资本—政治—社会”权力失衡状态下的“红蓝”对决与“紫色”（红色+蓝色）问题的恶化。帕特南所提出的推动低收入工人阶级的经济持续复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低价优质专业托儿服务、实现不同学校之间的资源再分配和社区再造等解决方案，完全符合机会平等信念所代表的美国价值观，却因为上述失衡与对决等而难以实现，也就难以结束“两个美国”的残酷现实。

“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美国梦曾经长期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美利坚民族的粘合剂。美国是一个仅有二百多年历史、由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美利坚民族本身是从无到有构建出来的，美国梦则是塑造和黏合美利坚民族的信仰所在。《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变化的真实图景展现出来，尽管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机会平等是美国社会的基调，但是今天的美国梦正处于富人的“成功者有资格坐享其成之梦”和穷人的“遥不可及或破灭之梦”相对立的裂变之中。“我们的孩子”变成了“我的孩子”与“他的孩子”相区隔，这种区隔背后是资本全球肆意扩张、金钱政治、产业空心化、新技术革命等带给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深刻改变，是社会分化与固化带来的阶级隔离与阶级矛盾的日益恶化，是美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失去其共同信仰与梦想的现实危机。

今天美国机会平等鸿沟的加剧和社会共同体的趋于瓦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反面教材。当高速度和粗放式的发展在中国不再可持续，中国的阶层固化等也正在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数千年来，贫富悬殊是中国政治伦理视为“恶政”的重要标准，“不患寡、患不均”更是深入人心的政治警句。并非富裕，而是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非精英的成功，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目标。